

漱涤人间世态 曲尽童心真情

——读赵丽宏长篇儿童小说《黑木头》

■舒伟

最近读了赵丽宏先生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黑木头》，第一感觉它与格林童话《三种语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通过一只流浪狗引发的曲折动人的故事，艺术地揭示了当代语境下有关爱和拯救的人生至理。这部由作者花费数年精心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扎根于现实生活，又来自生活的一段有关流浪狗的原型素材升华为一篇寓意深刻、令人难忘的儿童文学佳作，实属难能可贵。

在一座城市夜色迷离的傍晚时分，小男孩童童和妈妈在探望外婆的路途中遭遇了一条名叫“黑木头”的流浪小狗。童童的妈妈是个爱狗人士，母子俩开始关注这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想方设法地去接近它……从总体看，这部长篇儿童小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若容易却艰辛”。它以儿童文学的形式漱涤人间世态，又自辟村落，展开故事，奏出一曲有关人和狗相互拯救，童心真情创造人间奇迹的咏叹之歌。而孤独流浪小狗黑木头的转变更牵动人心，令人欣喜。

小狗与原先的老太太主人朝夕相处，相依相伴，生活平静而安详。然而独居老太太年事已

高，夜里发病离世虽属不幸，亦是可预见的，这也是当下有关独居老人的社会问题之一。老主人离世，小狗黑木头被利己主义者邻居收留，命运即发生逆转，每况愈下，陷入悲惨绝境。惨痛的受虐经历使它从此对人类产生强烈的抗拒和敌视心理，时刻保持与人的戒备距离，同时顽强地在野外生存下去。童童母子俩长达一年多的关注关爱和远处投食给黑木头的生存境遇带来极大的改观；外婆的出现唤醒了黑木头对过去相依相伴的老主人的温馨记忆。当黑木头濒临死亡边缘，经过童童母子俩的恳求和小白医生的救治得以重生之后，它才顺理成章地住进外婆之家，与外婆相依为伴。令人惊奇的是，当它见到外婆时，情不自禁地奔到外婆脚边，“抬起前肢站起来搭在外婆身上，嘴里呜呜地叫着，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倾诉”。外婆的家终于成为黑木头的归属，外婆坚信黑木头与自己是前世的亲人，黑木头与外婆的前缘最终以黑木头拯救外婆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悲壮的惊叹号。

童童代表着天真烂漫、充满好奇和同情心的儿童的世界，而



《黑木头》
赵丽宏著
天天出版社出版

外婆则代表着饱经风霜的迟暮老人的世界，童年世界与暮年世界通过一家人与一条流浪狗际遇而发生碰撞。作为人类个体生命中特殊的人生阶段，童年具有独特双重性。童年是无畏的、充满想象的、心比天高的，但童年又是受到诸多限制的、摇摆不定的、蒙昧无知的，需要成人的呵护和引领。“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是因为牛犊认为自己比老虎强大，而是因为它对于老虎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致命后果一无所知。童童喜欢小

狗是发自内心的天真冲动，而从小厌恶狗的外婆则为童童提供了必要的关于狗的经验认知。外婆告诉童童，自己小时候很少有人养狗，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里才养狗。那时，狗这个词就是用来骂坏人的。而更重要的信息是，“以前很多人对狗的厌恶，其实是对恶人的厌恶”。狗本身是忠诚的，但如果养狗的人是个恶人，那么这狗就会跟着做坏事，这就是“狗仗人势”。童童爸爸除了给童童讲述古今中外有关狗的聪明和灵性的奇闻轶事，还告诉童童，人们对狗的评价大多出自人的好恶标准。狗不会分辨人间的善恶，只要是主人，它们都会忠诚不贰。恶人养狗，狗就会帮着作恶，乱咬乱叫，“只要人心向善，恶狗大概也会越来越少吧”。当然，正如格林童话《三种语言》所揭示的心理意象，狗是人格中原始而丰富的资源，既具有暴烈的侵犯性和破坏性的原始冲动，又是忠诚和友谊的最好代表，人们要做的就是将其能量释放出来加以升华和利用，从而获得人格整合，去追求更高的理想，这也是儿童应当认知的人生道理。

女诗人 J. A. 卡尼（1823-1908）写于 1945 年的诗句为这

个发生在人与狗之间的动人故事做出了最好的题解：

滴滴小水滴，颗颗小沙粒，
汇成海洋，聚成好田地。

件件小善举，句句暖人语，
喜看人世间，处处成乐园。

一分一秒钟，瞬间即已逝，
汇成大时代，无穷又无尽。

《黑木头》的作者赵丽宏先生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最深刻意义，以及最难忘的人生感悟倾注在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之中，以追求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完美融合。这种融合既能满足稚拙而富有想象智能和自然情感的儿童读者的心理需求，又能触动那些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成人的心境。这两个世界通过一条神秘孤独的流浪狗所引发的故事联结起来，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一种复合的理想人格得以形成，一个卓越的故事诞生了。正如批评家科林·曼洛夫指出的：“那些为儿童创作的最优秀作品是由那些似乎忘记了自己在为谁而写的作者创作出来的，因为话语的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如此完美地融合起来。”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确能够在心底深处打动我们，同时引领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走向未来。

读诗读词难读心

■潘飞

近几年，传统文化在华夏大地渐成复苏趋向，日见盛象。“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无不折射出这样渴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全民心境。

读诗，让浮躁的现代人与失去的原乡和远方离得更近些，但在李劫看来，上千年来的诗论词话过分偏向意识形态的浸染和导引，不仅直接导致众位诗人、词人被标签化、脸谱化甚至污名化，而且间接将国人的诗性修养、美学趣味等一一带偏——后人在阅读唐诗宋词时，多停留在考较词句间的政治意义（即社会性），反而忽略了梳析其人性（即诗词作者通过嬉笑怒骂所透散出来的或顽劣、或沉郁、或浮薄、或刚毅等种种性情），甚至严重误读了诗词的言外之意。《唐诗宋词解》中的李劫，笔锋犀利，激昂难止，想常人不能想，言常人不敢言，其撰著此书的目的，可以说是给唐宋两朝那些名声赫赫的诗家、词家们勾勒了一幅玲珑有致的“众生画像”。

如副书名所言，李劫主张“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在他看来，立足史家以治唐诗的陈寅恪先生多考据历史细节，常以家国情怀、功名利禄等来衡量列位诗人，如此单向度的点评方法少了些可亲可爱的人情味。因此，从写作方式来说，李劫把大家名句杂糅在琐碎且复杂的人性中，带我们通过只诗片词，钻探诗人、词人们那无比广袤、深邃的内心世界。“唐诗的初唐气象，与其说是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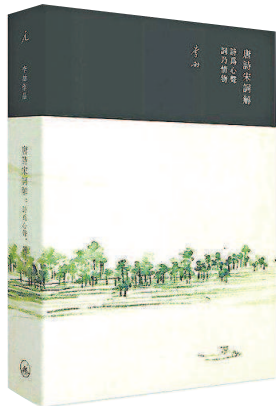
象在诗歌上，不如说是气象在诗人上”，此言印证李劫绝不就“诗”论“诗”，而是由“诗”观“人”，打心眼里，他是瞧不起那些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的，只有那些拥有七情六欲、无比真实的诗家、词家才值得他点赞。

“诗风的明媚，源自心胸的敞亮”，所谓我手写我心，诗如其人，人有人品，诗亦如此，读诗是为了咀嚼“诗品”，通过李劫的导引，我们可以得窥骆宾王的骨鲠高傲、贺知章的放浪形骸……李劫的眼光不可谓不毒辣，其对人的分析也颇为有趣：唐太宗有头脑，但无性情可言；宋徽宗有性情，却没头脑；唐玄宗既有头脑，又有性情，恰是他的诗意性情，才是解开盛唐诗歌奥义的历史密码。王维与孟浩然两两相较，人生观、价值观植人各自的诗词中也颇为有味——孟浩然的寂寥，是牵挂着庙堂的寂寥；而王维的“孤烟直”，才是沧桑之后的孤寂和落寞。所以，王维能够看空，孟浩然只能无以见空入空。

在李劫看来，千年来的史家和普通民众，读词和论词时，皆不以情为意，蔑视人之常情。所以，李劫要撕破唐宋名家们的另一副嘴脸：与官家的意识形态系统离得越近的诗人，越发追求“诗言志”，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是反人性、钳制情感、压抑自由之美的，所以，唐宋八大家被儒家道德伦理捆绑得太紧，后代将韩愈捧得越高，反而证明

士风一代比一代更为堕落。李劫精准地点出：权力是“文学的毒药”，这可以拿杜牧为证，樊川居士喜欢在谈论政治生活时掺入女人元素，动辄把江山与女人捆绑起来，而他对于女性，只有欲念而无柔肠，貌似多情却无情，所以写恋情写不过内心纯净的温庭筠。

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词都有其生就的语境，皆以“情”为中心，在情与诗词的转换过程中，李劫构筑出眼观之境、身临之境、身心俱境三层境界，一个“情”字，彰显出诗词众家不同的层次、心胸和况味。由此观之，大晏小晏的情是傲娇的情，他们总保持旁观姿态，虚构情愫，更凌驾于“情”之上，所以词作只能浮于表面，未能让人感觉荡气回肠。而只有达到第三个境界，才能形成天人合一，进而写出令人震撼的慈悲、悲悯的气度、高贵的心胸。简言之，有人情味的词人才能写出好词，人情味是灵性，也是教养。中国传统诗学是肯定和张扬人情的人文诗学，也是强调诗人主体作用的主体诗学，所以，从以上路数来看，李劫应当被划入中国诗歌理论的“诗缘情”派，他的观点与陆机在《文赋》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两相对应，无论是“触景生情”“因情造景”，还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不过是技术手法的不同，追求的都是“物象关情”，不过，在笔者看来，从理路上说，



《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
李劫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李劫发展性地将“诗缘情”升级到了另一个层次：“诗人缘性情”。

在书中，李劫将王之涣、李白、王昌龄分别唤作“黄河少年”“陇西少年”“边塞少年”，其实，他的笔墨间就弥散着一种少年意气，富有趣味和才情，他痛恨浮夸造作，崇尚真情实感，尽管不少观点有待商榷，但《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写出了李劫的一家之言，这种不落窠臼、敢于挑战权威的独立精神，实在是做学问必须的品质。因而，对打小就被各种语文教材里的官方释解所包裹的国人来说，本书或可引发读趣和文思，并在另辟学术路径方面辅以有益借鉴。李劫无意改写诗词史，但他的眼光，锐利且清晰，带我们看清文采熠熠、群星闪耀的诗词史的夜空，令我们明白：读诗词，始于读人，也止于读人，读诗词是文学，读人是经世，乐趣横生，竟有别样滋味。